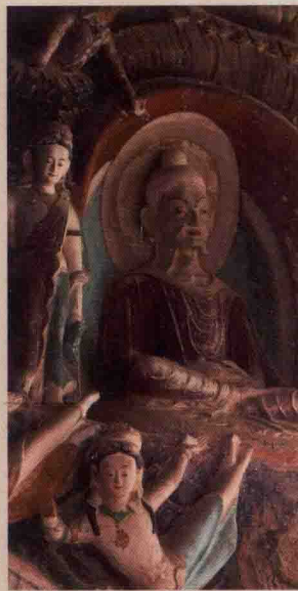


丝路石窟艺术研究丛刊

张宝玺 著

河西北朝石窟



上海古籍出版社

甘肃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段，佛教循此东传，是佛教石窟密集的地方。

早在十六国晚期就孕育建造石窟，为石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石窟的营造盛期是在北朝（北魏、西魏、北周），

那时就奠定了河西石窟的基本规模。

河西石窟以敦煌莫高窟为首，

而他处石窟往往被忽略。

本书旨在全面收录研究敦煌石窟以外的天梯山、

千佛洞、

文殊山等河西石窟十一处，

以大量图版和研究相结合，

展现了河西走廊石窟总体面貌。

这些石窟规模大小不等，要者，

都是以中心柱窟为精华。

大多数是在中心柱上四面开龕造像，

窟壁绘千佛、

顶披或塑或绘十方佛的千佛窟，

构成了一个虚幻的佛国世界，

随之就产生了塑绘多彩的佛教艺术，

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其造像风格的演变较中原滞后一些。

其造像为他处鲜见。

张宝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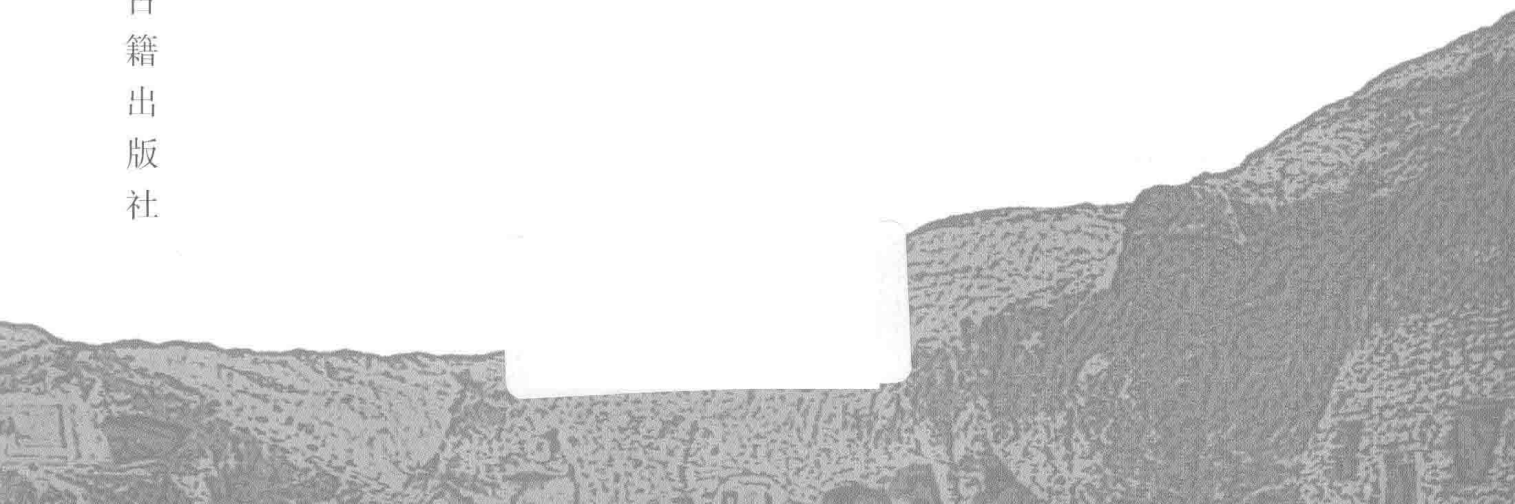
造像为他处鲜见。

丝路石窟艺术研究丛刊

张宝玺 著

河西北朝石窟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西北朝石窟 / 张宝玺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1

(丝路石窟艺术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8071-2

I. ①河… II. ①张… III. ①石窟—甘肃省—北朝时代—图录 IV. ①K87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7241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丝路石窟艺术研究丛刊

河西北朝石窟

张宝玺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4.5 插页 68 字数 314,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071-2

K · 2198 定价: 2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言

黄文昆

中国佛教石窟寺遗存,因其宗教、历史和美术等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堪称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枝奇葩。20世纪以来,张大千、常书鸿、向达、石璋如、史岩、阎文儒等诸位先贤开拓在前,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界不断努力,对于古代石窟寺的调查研究逐渐深入。

20世纪70年代中叶,刚刚散去了“文革”十年浩劫的阴霾,中国出版界开始推出佛教石窟寺遗产的图书,学术界迎来佛教文物考古和敦煌学研究持续近20年的热潮,甘肃省境内的石窟群落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首先是敦煌学的源头敦煌石窟,其次是秦陇地区的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随后是分布在陇东泾河流域、陇山深处,以及河西走廊敦煌以东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的诸多石窟群。作为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主要通道的河西走廊,其中的石窟寺遗存备受重视。毕竟,相对中原皇家系统和与长安佛教关联的关陇系统而言,地处交通线上的河西系统具有特殊意义。河西石窟美术及其宗教内涵,更多地表现出来自佛教源头方向的各种影响。以敦煌研究院为中心,敦煌石窟研究力量相对齐整,学术活动颇成规模,有关莫高、榆林等石窟的研究成绩不菲,影响较大。而其他各地的石窟群,诸如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千佛洞、金塔寺和武威天梯山、圣容寺等,也都是河西石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舍此则无以实现河西系统石窟寺历史的整体性研究。

甘肃省文物部门专事石窟寺和佛教文物研究的张宝玺先生,素具美术学养,在长期考古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精于调查、著录、测绘、文物摄影、历史考证等,堪称全方位的专家。半个多世纪来,张先生不辞辛劳、尽职尽责,对省内石窟寺不断进行周密的调查和考释,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率先系统介绍炳灵寺石窟和陇东石窟,为《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和《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撰写高水平的论文《炳灵寺石窟西秦洞窟》等,并承担二书的图版摄影。此后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完善了对于甘肃佛教石刻、北凉石塔的资料整理与研究,通过对河西中小石窟的全面调查,对河西北朝石窟的形制、年代、题材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得出了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河西北朝中心柱洞窟的论证,明确揭示了这些洞窟的建造年代。张宝玺先生指出,“河西北朝石窟从东到西都是以中心柱窟为主导”,若以北魏石窟而论,河西中小石窟现存14座北魏窟中有11座中心柱窟,而在敦煌,则可确认北魏时代的洞窟几乎全部是中心柱窟。“时代相当于北魏中期,具体年代推定在465年至500年左右”,“是北魏河西造窟盛期的产物”。“方形石塔和石窟中的方形塔柱,恰好体现了北

魏的时代特征。”由此摒除了在北魏中心柱窟中妄指“北凉石窟”遗迹的臆想，正本清源，多年陷于迷茫的问题归于清晰。我认为这是张宝玺先生为中国北朝石窟考古研究所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简淡平实、不事虚夸、质朴无华，张宝玺先生文如其人。此次提交出版的《河西北朝石窟》，是先生经 20 年锤炼的力作。本书第一次以翔实的论述和丰富的图版，将河西地区除敦煌以外的中小石窟系统、全面地介绍给读者，从而衔接敦煌，建立起河西石窟研究整体性的框架。为此，张先生曾在这绵延上千公里路途崎岖的地域中，反复踏查、记录、测绘、摄影、考证，本书全部成果无不亲历亲为，因而更具有权威的意义，为今后河西石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付梓，张宝玺先生已届八旬耄耋，衷心祝愿他高寿，并向他致以深挚的敬意。

2015 年 5 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黄文昆	1
第一章 河西北朝石窟概论		1
第一节 自然面貌及历史沿革		2
第二节 河西走廊北朝佛教石窟的分布		3
第三节 河西北朝石窟的年代		8
第四节 以中心柱窟为主的河西北朝石窟		16
第五节 造像风格之演变		21
第二章 河西北朝石窟分论		23
第一节 武威天梯山石窟		24
第二节 永昌圣容寺石窟		40
第三节 张掖南山金塔寺石窟		45
第四节 张掖南山千佛洞石窟		58
第五节 张掖南山马蹄寺石窟		75
第六节 张掖南山上、中、下观音洞石窟		87
第七节 民乐童子寺石窟		94
第八节 酒泉南山文殊山石窟		98
第九节 玉门昌马石窟		115
第十节 瓜州旱峡石窟		121
第十一节 肃北五个庙石窟		124
第三章 河西北朝石窟大事年表		133
第四章 河西北朝石窟内容总录		149
河西北朝石窟图版说明		205
后 记		225
图 版		

第一章 河西北朝石窟概论

第一节 自然面貌及历史沿革

河西,即黄河西界,位于今天甘肃省西部,东西长而南北窄,多称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迄敦煌以西的沙漠,南枕横贯千里的祁连山,北邻合黎山、马鬃山及广漠。在这狭长的地带,依靠祁连山融化冷雪滋养着几片沙漠中的绿洲。秦汉以前,这里是月氏和匈奴故地。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初开丝绸之路。公元前121年西汉开始向河西用兵,驱逐匈奴。公元前111年分别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即历史上的“河西四郡”。两汉,河西属凉州刺史部。曹魏、西晋于武威置凉州,统辖河西诸郡。十六国时期先后在河西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封建割据政权。前秦、后秦也曾一度统治这里。北魏在这里分设凉州镇和敦煌镇,后改置凉州和瓜州。西魏、北周置凉州、甘州、瓜州。隋置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唐代置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归陇右道。中唐时,河西被吐蕃占领。晚唐时期张议潮起兵恢复了唐朝对河西的统治。晚唐、五代,回鹘进入河西,建立甘州回鹘汗国,凉州为蕃汉联合政权。走廊西端的瓜、沙二州,晚唐、五代至宋初一直在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下。此后河西为西夏所据。蒙古灭西夏后,河西隶属于甘肃行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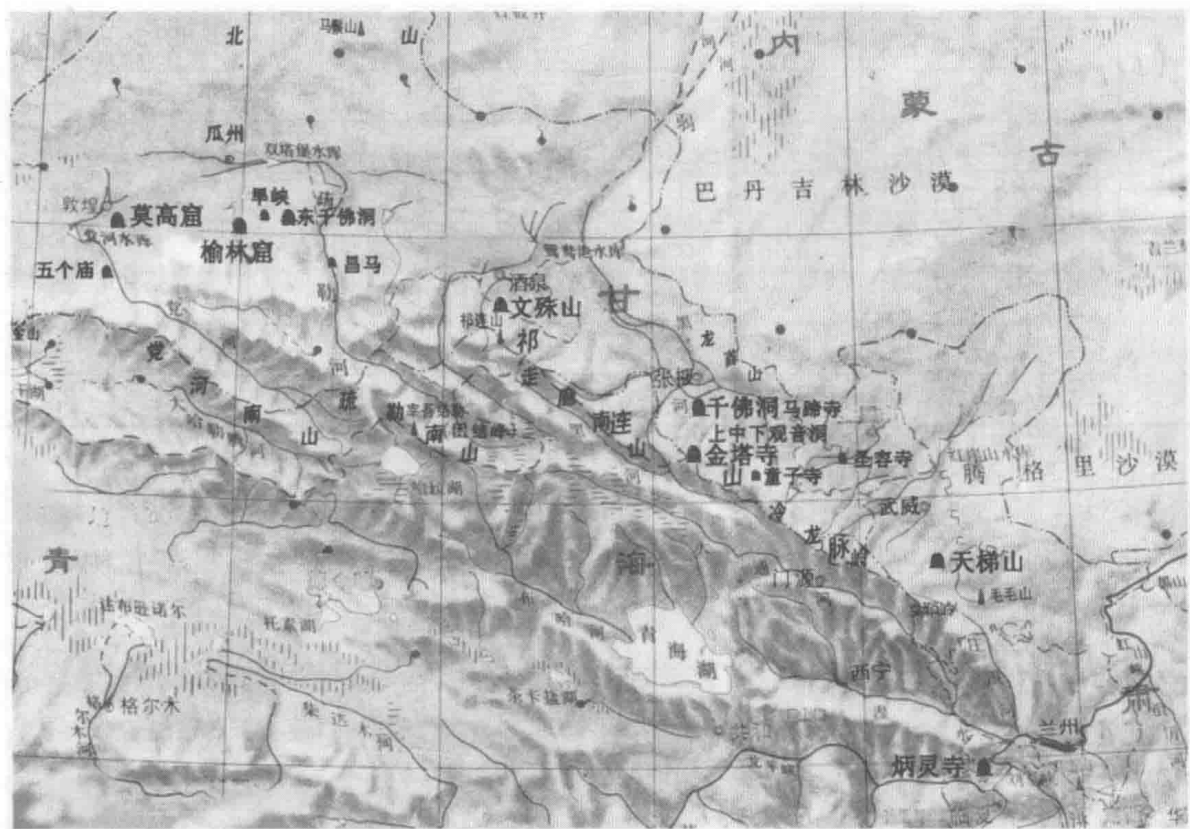
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主要陆上道路,也是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汇之地,历代王朝多通过经营河西来节制西域,打通西方的门户。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主要就是沿着这一通道传入内地,并在河西本土驻足发展。

河西石窟从公元4世纪十六国中晚期开始孕育兴起,至14世纪中叶元代末年,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

河西地区可能在十六国晚期已先于全国其他地方创窟,那是石窟创建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阶段,但数量毕竟有限。据记载,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凉州石窟)以及河西以东的永靖炳灵寺(唐述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都始建于十六国晚期,但唯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420)建窟题记,其他石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窟内都没有找到直接年代证据。到了北朝(北魏、西魏、北周)河西石窟进入盛期,基本布局业已形成。隋唐石窟艺术灿烂多彩,但都集中于莫高窟、榆林窟这样一些大窟群,河西其他地方石窟修建规模反而缩小,分布零散。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政权在其辖境瓜、沙二州境内新建或重修了一批石窟,对敦煌石窟艺术作了重要的延续和补充。西夏和元代河西石窟再次兴盛,规模庞大再显辉煌,且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第二节 河西走廊北朝佛教石窟的分布

河西走廊石窟寺的分布相当集中,包括莫高窟、榆林窟在内共有大、中、小石窟群落 16 处,见表一。如果将全残及年代不清的石窟计算在内则更多(如永昌云庄寺石窟、石佛崖石窟、肃南皇城石佛崖石窟、玉门昌马乡大坝石窟等,均未入表)。表中所列为主要石窟,每处少则二三窟,多则数十窟。河西石窟时代跨度大,从十六国晚期石窟寺兴起,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明、清一千五百多年时间内不断有石窟建造。他们的始创年代,除榆林窟始于唐,东千佛洞和亥母寺始于西夏,马蹄寺始于元,余者都始于北朝(图一)。佛教极为兴盛的北朝时期奠定了河西石窟的基本规模。其后陆续有建造。



图一 河西石窟分布图

本书介绍表一中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以外的河西北朝石窟(前三处已经由敦煌研究院出版多种研究专著,后者详见拙著《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年),旨在重点研究河西北朝的中小石窟,收入的范围是天梯山石窟、圣容寺石

窟、金塔寺石窟、千佛洞石窟、马蹄寺石窟、上中下观音洞石窟、童子寺石窟、文殊山石窟、昌马石窟、早峡石窟、五个庙石窟。其中马蹄寺石窟起建于元,虽然不是北朝石窟,但因为包括北朝石窟在内的张掖南山各石窟曾经被总称为马蹄寺石窟,且它在这个群落中规模最大,似不可缺少,故破例收入。

表一 河西石窟一览表

	石窟寺名称	地点	时代	窟龕数
武威市	天梯山*	武威市	北凉 北魏 唐	19
	亥母寺	武威市	西夏	4
	圣容寺*	永昌县	北魏	1
张掖市	金塔寺*	肃南县	北魏	2
	千佛洞*	肃南县	北魏 西魏 北周	8
	马蹄寺*	肃南县	元 明	9
	上中下观音洞*	肃南县	北魏 元 明	26
	童子寺*	民乐县	西魏	8
酒泉市	文殊山*	肃南县	北魏 西魏	12
	昌马石窟*	玉门市	北魏	4
	早峡石窟*	瓜州县	北朝晚期	2
	榆林窟	瓜州县	唐一元	42
	东千佛洞	瓜州县	西夏	10
	莫高窟	敦煌市	十六国晚期 北魏一元	492
	西千佛洞	敦煌市	北魏晚期一元	22
	五个庙*	肃北县	北周	6

注:凡标*符号者均编入本书。

这些石窟都分布在河西走廊的南侧、横贯东西的祁连山前缘地带,分别邻近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城市。

天梯山石窟,史称凉州石窟,近考,唐宋时期一度称洪元谷大云寺,明代称广善寺,俗名大佛寺,位于武威市东南 45 公里、黄羊河流域张义堡盆地内。源自祁连山的黄羊河从窟前穿过。黄羊河水库建成后,窟前变成了一片浩淼的湖面,且底层的几个洞窟及滩地在汛期即被水浸泡或淹没。

圣容寺石窟,在永昌县北 12 公里御山谷中,处在武威通往张掖的大道上,明长城在这里蜿蜒经过。

金塔寺石窟位于张掖市南 60 公里马蹄山(临松山)的崇山峻岭中,今归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大都麻村辖境,石窟就坐落在大都麻河西侧的一个小支流刺沟源头。

千佛洞石窟位于张掖市南马蹄山前马蹄谷内,濒临马蹄河,现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乡。溯马蹄河南行进入马蹄谷,首先迎面的便是千佛洞石窟。南行3华里即可到达马蹄寺。

马蹄寺石窟位于张掖市南马蹄山下,因山而得名,现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乡。马蹄寺石窟大盛的时候,前述金塔寺石窟、千佛洞石窟,以及上、中、下观音洞石窟等相当范围内北朝以来的所有石窟,统称马蹄寺石窟。而马蹄寺石窟北寺本身,则创建于元代,明代续建。

上、中、下观音洞石窟位在金塔寺石窟之北2至5公里的范围内,即以马蹄寺石窟为中心,位于马蹄寺石窟东南10公里的范围内。他们各自构成一个独立的小群体,彼此之间相距二三百公里,各凿洞于山巅或高峻的崖壁上。

童子寺石窟位于民乐县城东10公里,在童子坝河东干渠的右岸崖壁上,依山面水,坐东向西。南距祁连山要隘扁都口不远。

文殊山石窟位于酒泉市西南15公里的嘉峪山中,文殊沟源自雪山,石窟集中在文殊沟北岸两座山山腰间。历史上属酒泉辖区,现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区管辖。

昌马石窟位于玉门市玉门镇南50公里昌马乡境内。石窟位于昌马河(疏勒河)流域昌马盆地中部水峡村西南的崖壁上。

早峡石窟位于瓜州县南50公里彪杆子山北麓早峡口西崖。早峡本身是一条干涸河床,南入雪山,北临绿洲。

五个庙石窟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所在地党城湾北20公里,坐落在党河左岸浪湾小盆地内,党城湾自古就是敦煌的南大门。自汉代以来就在党河流域敦煌至南山间构筑烽燧,用于军事上的需要和报水讯。五个庙石窟以北与敦煌莫高窟直线距离只有45公里,古有马道可以相通。

河西石窟被学者所重视,始于上世纪40年代初,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向达先生已注意到对文献记载中北凉沮渠所建凉州石窟寺的寻访,并寻访到武威东南张义堡天梯山大佛寺,即文献记载中的凉州沮渠蒙逊斫窟^①。1945年9月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对千佛洞和马蹄寺石窟做了调查,登临了第3窟(三十三天),考察了大经堂^②。

1952年,甘肃省著名学者冯国瑞等人对天梯山石窟作实地考察,披露于报端,引起国人的注意,并著有《天梯山石窟图录》稿(未刊稿)。

1954年,我国第一代敦煌石窟研究学者史岩先生,满怀探索精神,以极大的毅力先后对武威天梯山石窟、祁连山民乐县境石窟(现归肃南县,即马蹄寺石窟群)、酒泉南山文殊山石窟做了实地勘察。关于天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文称:“天梯山石窟是由(北凉)蒙逊首先创凿的,可是他所创凿的石窟现在已不存在了”。他将两座中心柱窟,定为北朝式石窟,并未肯定是北凉石窟。

① 见向达《西征小记》,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

②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下)》,刊《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至于所列金塔寺、文殊山洞窟,认为最早者为北魏洞窟^①。

1959年,因建黄羊河水库,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和甘肃省博物馆组成武威天梯山石窟勘察搬迁工作队,对天梯山石窟实施全面考古清理工程。此项工程中清理出正在坍塌的一座中心柱窟(第18窟)。至此天梯山石窟共编号19窟。首次提出第15、17窟疑为北凉—北魏洞窟。第1、4、18这三座中心柱窟被认定为北凉洞窟^②。

196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进行了调查,由于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此前已有炳灵寺石窟西秦建弘元年(420)题记的发现,由此推理河西石窟年代不会晚于西秦石窟。对于河西石窟,文称:“我们认为应该属于十六国五凉时期(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公元317—439年),特别是北凉。”由此将河西大大小小的石窟全部确定为北凉石窟,造成北朝(北魏、西魏、北周)石窟的分期序列出现错乱与断层,而且无法与敦煌石窟分期相衔接,更不能以云冈、龙门石窟为据来讨论河西石窟。所编《河西石窟》图录仅收入部分石窟,并非河西全部主要石窟^③。

1992年起,台北故宫博物院李玉珉教授多次组团考察金塔寺石窟,其研究结论认为,东窟的开凿年代约在5世纪的50年代或60年代。西窟的开凿年代约在5世纪的70年代稍晚。认为两窟时代关系有先后^④。

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实习,对河西早期石窟进行了考察。按这次考察的分期:天梯山石窟一期洞窟(第1、4、18、17、16窟)比定在北凉都姑臧时期(412—439),二期洞窟(第5、6、7、8、9窟)比定在北魏末至西魏时期(510—550);张掖地区早期石窟一期洞窟(金塔寺东、西窟,千佛洞第2窟)比定在北魏太和及稍后年代的北魏时期,二期洞窟(千佛洞第1、3、4、8窟、下观音洞第1窟、童子寺第1、2、8窟)比定在北魏末至西魏时期(510—550);文殊山前期洞窟(第9、10、11、12窟)和后期洞窟(第7、8、1、2、3、4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把他们置于北魏太和及稍后的北魏时期;昌马石窟比定在文殊山早期石窟相同的年代里(即490—538)。综观这个分期,天梯山石窟的3座中心柱窟及2座方形窟被定为北凉洞窟。金塔寺、千佛洞、文殊山石窟为北魏、西魏、北周洞窟,而且上限不超越北魏太和及稍后的北魏时期^⑤。

河西石窟研究的升华有赖于宿白教授对五凉典籍、遗迹、文物的综合论述,结合石窟发展史,

① 史岩《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史岩《散布在祁连山区民乐县境的石窟群》,刊《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史岩《酒泉文殊寺的石窟寺院遗迹》,刊《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② 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编著,张学荣、何静珍、吴怡如执笔《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③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刊《文物》1965年第3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 李玉珉《金塔寺石窟考》,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⑤ 暨远志《酒泉地区早期石窟分期试论》,刊《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暨远志《张掖地区早期石窟分期试论》,刊《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暨远志《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分期试论》,刊《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

提出具有概括性的凉州模式。其结论为：“我们考虑凉州模式似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可参考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五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龕像；晚期可参考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龕像。”^①

①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刊《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第三节 河西北朝石窟的年代

河西石窟有明确年代记载的很少。年代问题,只有以考察实物为基础,查阅相关文献,作出适当的推论,排列出相对的年代。

诸多石窟文物中,石窟创建年代有明确依据的凡两处:

一是文殊山石窟,可以肯定起建于公元6世纪20年代,据现存的元泰定三年(1326)喃答失太子立石《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记载:“所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据此碑推算,考证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或此前的正光、神龟、熙平年间,总之在孝明帝时期比较接近事实^①。

二是圣容寺石窟,即佛身雕于北魏正光元年(520),佛首成于北周明帝元年(557)的凉州瑞像。关于“凉州山开瑞像现”的故事,见于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释迦方志》等及唐道世《法苑珠林》中(文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系照录道宣的记载)。武威出土的唐天宝元年(742)石碑《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也讲述这个故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及藏经洞的绢画中有很多表现这个故事的画幅。

河西石窟文献方面资料很少,且皆出自僧传和佛教类书,多载的是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奉佛毁佛及斫窟动机问题,主要的有下列几则。

公元519年成书的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大正藏》T50, P335):

至逊伪承玄二年(429)蒙逊济河,伐乞伏暮末于枹罕,以世子兴国为前驱,为末军所败,兴国擒焉。后乞伏失守,暮末与兴国俱获于赫连定定,后为吐谷浑所破,兴国遂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即遣斥沙门,五十已下皆令罢道。蒙逊先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昙无)讖又格言致谏,逊乃改心而悔焉。

唐代道宣(596—667)的著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释迦方志》中凡四见。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十五(《大正藏》T52, P417):

^① 《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以下简称元碑,现存文殊山石窟,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回鹘文已由耿世民教授译出,文见《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碑文见本书内容总录。

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中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坳地，观其行不，人才远之，便即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十六(《大正藏》T52, P418):

北凉河西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遣世子兴国攻抱罕大败，兴国遂死于佛氏，逊恚恨，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塔寺，斥逐道人。逊后行至杨述山，诸僧候于路侧。望见发怒，立斩数人。尔时，将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泪横流，惊还说之。逊闻往视，至寺门，举体战悸，如有把持之者，因唤左右扶翼而进。见像泪下若泉，即稽首礼谢，深自咎责，登设大会，倍更精到，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焉。观逊之为信佛深明，攻杀以取，岂佛之为非禁也。性以革改为先，任意肆恶，知何所恶不至。初重法，(昙无)讖译大涅槃愿同生死，后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咎佛僧，殄寺诛僧，一何酷滥。晚虽再复，不补其愆云。今沙州东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凶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发云。

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第三《佛像瑞迹》(《大正藏》T52, P202)

凉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逊王有凉土，专弘福事，于此崖中大造形像，千变万化，警人眩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无时暂舍，遥见便行，人至便止，观其面貌，如行之状。有罗土于地者，后看足迹纳纳。今见如此。

道宣《释迦方志》卷二《通局篇》第六(《大正藏》T51, P973):

又凉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逊所造，碑寺见存。有素圣僧，常自行道，人来便止，人去寻行。故其傍侧足迹纳纳尔。斯徒众矣，不可具云。余闻《入大乘论》尊者宾头卢、罗睺罗等十六大阿罗汉住世通法，又有九亿无学亦此洲中未入涅槃，准此而详，今诸山居多闻磬声，或寻遇寺，岂非诸圣之所处乎？

道世《法苑珠林》中二见，文同道宣著述。

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三《北凉河西王南崖塑像缘》及《北凉沮渠丈六石像现相缘》(《大正藏》T53, P387):

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久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盼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宇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盆地,观其行迹,人才远之,即便蹈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北凉河西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遣世子兴国攻抱罕,大败。兴国遂死于佛氏。逊恚恨,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塔寺,斥逐道人。逊后行至阳述山,诸僧候于路侧。望见发怒,立斩数人。尔时将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泪横流。惊还说之,逊闻往视,至寺门,举体颤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唤左右扶翼而进,见像泪下若泉,即稽首礼谢,深自尤责。登设大会,倍更精到,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焉。观逊之为信。信不深明,攻杀以取,岂佛之为非禁也。性以革改为先,任意肆恶,知何所而不至。初重法,讖译大涅槃,愿同生死,后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咎佛僧,殄寺诛僧,一何酷滥。晚虽再复,不补其愆云。今沙州东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凶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发。

又见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九《神州诸山圣僧》(《大正藏》T53, P429):

又凉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逊所造碑寺见存。有瘞圣僧,常自行道,人来便止,人去寻行。故旁侧足迹纳纳示现,然徒众不可见之。

这些记载,以慧皎的记载年代最早,成书于南北朝时期。

慧皎(497—554),南朝梁高僧,于梁天监十八年(519)著《高僧传》十四卷。《高僧传》卷二《晋河西县无讖》记载了沮渠蒙逊北凉承玄二年(429)渡黄河伐乞伏暮末于枹罕,兵败其子兴国被俘一事^①。沮渠蒙逊闻讯大怒,遂有遣斥沙门罢道之举。而先为其母所造丈六石像遂泣涕流泪。说明此际已有这个丈六石像了,造像时间不会晚于北凉承玄二年(429)。

道宣(596—667)生活的年代是在隋代到唐代初年,著作甚丰。始记沮渠蒙逊于凉州南百里就而斫窟,为其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沮渠蒙逊斫窟之事,都出自道宣一人手笔,尚无其他典

^① 《资治通鉴》载,此役是在该年“六月,暮末逆击兴国于治城,擒之,追击蒙逊至谭郊”,中华书局标点本,3811页。

籍材料可以相印证,研究者对其可靠程度自然会产生一定疑虑。因为是唯一记载,更值得在此探讨。道世(?—683)《法苑珠林》中凡二则记载,皆采自道宣的著作,仅对山寺名有所更改。

綜上述,可以归纳这样几个问题来加以讨论:

其一,沮渠蒙逊斫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所说沮渠蒙逊“于(凉)州南百里”建凉州石窟,正是《广弘明集》中“凉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所在。亦即《释迦方志》中“凉州南洪崖窟”。道宣于此记述了凉州南山一处石窟始建于北凉这样一个事实。其地理位置正好与今天的天梯山石窟相符,但是否具有“连崖绵亘,东西不测”的规模,实属疑问,可能是由传闻演化的夸大之辞。应该看到天梯山石窟唐初仍在大规模营建,名盛一时,道宣所记应该是唐初形成的景象和规模。

其二,沮渠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释迦立像一丈六尺,坐像八尺。常人身高八尺,释迦倍之,以示其殊胜,可知是一身立像。丈六佛像之造立,印度颇为盛行,如《法显传》僧迦施国条:“王益敬信,即于阶上起精舍,当中阶作丈六立像”;《大唐西域记》卷二犍驮逻国条:“大宰堵波石陞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中大塔之“南百余步,白石佛像高一丈六尺,面北放光”。我国东晋时的丈六佛像又如道安于宁康三年(375)在襄阳檀溪寺铸造丈六无量寿佛像、慧护于太元二年(377)在建业绍灵寺镕铸丈六金像等,凡达到此标准者即称大佛。以沮渠蒙逊的身份,这尊大型佛像应是北凉造像中的精华,所以引人瞩目,载于佛籍。

值得注意的是丈六石像的地望和安置的处所。丈六石像在于山寺,但“在于山寺”四字却并非慧皎所记,乃道宣所添加,其依据不详,其地址亦不明,可在山崖,可在山野,亦可在寺院殿宇中。按今日所见天梯山石窟造像,皆为石胎泥塑,当地山崖的红砂岩石质本不适合雕造石像。粗粝的岩石只堪凿斫大体轮廓,形体细部全靠敷泥塑造,即便丈六大像,亦不足以称石像。《感通录》所云“千变万化”、“或石或塑”可有两种理解,其一曰石像、塑像悉皆有之,其二就造型技法而言,曰石雕、泥塑两种技法综合应用而成作品,即石胎泥塑的意思,完全符合天梯山造像的实际,相比前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尤具合理性。石胎泥塑,虽泥石同体,但最终完成,其可视的外观,形象神态气韵均有赖泥塑的表现,泥塑是其更为本质的属性。故道宣又记“凉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即言明“泥塑行像”。那丈六石像又怎么会出现在“凉州南百里崖中”呢^①? 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若非在上佳石料产地雕好运来,抑或如天梯山第13窟大佛一样泥塑层剥落仅存石胎? 巨大的石像由远处运来显然是难就的工程。王者为母造像势必受到悉心的保护,不至于当世即表层剥落如此。可信的解释只能说此像不在石窟中,蒙逊为母造像与蒙逊斫窟不是一回事。误会出自道宣的添足。道宣的记载,原本出于传言,“彼人说之如此”。对于道宣的记载,今人也应该视同于“彼人说之如此”,待通过切实地考察、考证,获取真凭实据之后,方可做出科学的结论。已有学者怀疑丈六石像另有其地: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后

① 黄文昆《中国早期佛教美术考古泛议》,刊《敦煌研究》2015年第1期,15页。